

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评析

武保华

山西省朔州市委宣传部, 山西朔州, 036000;

摘要: 本文以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分析工具, 聚焦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进程, 通过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分田到户”改革案例, 揭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动态互动。研究以 1978-1984 年为观察时段, 剖析集体化意识形态滞后性、教育系统功能转型及“万元户”符号重构三重矛盾, 论证经济基础变革过程中非强制性意识形态调适机制的关键作用。案例显示, 政策推行依赖基层广播站、农业技术推广站等意识形态载体对传统话语的创造性转化, 通过物质激励与价值导向的协同作用实现社会结构的平稳转型。这一发现为理解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殊性提供了理论解释, 也为当代基层治理中的矛盾化解策略带来启示。

关键词: 阿尔都塞; 结构主义; 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

DOI: 10.64216/3080-1486.25.07.048

前言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中国农村改革为观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实践提供了独特样本。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不仅涉及土地制度调整, 更触及集体化时期形成的深层意识形态结构。阿尔都塞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为解析非对抗性社会转型中的观念冲突与调和机制开辟了新路径。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政策演变的制度分析, 却较少关注观念系统在制度变迁中的传导与重构功能。本文试图突破传统经济决定论视角, 将小岗村“秘密按手印”事件置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中, 重点考察地方政府如何通过教育内容转换、媒体符号重塑等非强制手段, 实现新旧生产关系的衔接过渡。这种基于中国经验的再阐释, 既是对阿尔都塞理论适用边界的检验, 也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结构矛盾分析方法提供实践依据。研究通过解密基层档案与口述史料, 揭示政策文本在乡村场域的多重转译过程, 展现意识形态再生产机制在改革初期的具体运作形态。

1 结构性矛盾显现

1978 年小岗村“秘密按手印”事件揭示了农村改革中集体化意识形态与新兴生产关系的冲突。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锅饭”观念在皖北农村影响深远, 部分基层干部和村民将包产到户视为“资本主义复辟”, 导致政策

执行陷入两难, 既要释放生产力, 又需维护集体主义话语合法性。凤阳县曾出现村民举报“分田工作队”的极端案例, 凸显制度变革初期价值与实践的脱节。

教育体系成为矛盾焦点。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夜校以阶级斗争教育为主, 其“越穷越光荣”理念与“多劳多得”原则直接对立。1979 年滁州地区的调研显示, 60% 以上的夜校学员对生产技术课程兴趣浓厚, 却抵触政治宣讲, 迫使基层调整教学内容^[1], 引入农业技术知识, 引发政治教员与技术专家的权力博弈。

符号系统的冲突同样显著。《安徽日报》报道凤阳“万元户”时, 部分读者批评其“助长个人主义”, 反映集体模范与个体致富的话语权争夺。地方政府通过改编政策口号为快板书、悬挂“爱国粮”标语等方式, 调和新旧话语, 但未能根本消除观念对立, 为后续改革留下意识形态调试空间。

2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调适机制

2.1 功能转换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过程中,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功能转换、话语重构与符号再编码三重机制, 实现了新旧生产关系矛盾的动态调和。这种调适并非简单的观念替代, 而是在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面连续性的前提下, 对传统话语元素进行创造性转化,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柔性过渡模式。基层教育系统的功能转型是

首要调适路径。皖北地区原有的“政治夜校”在1980年前后逐渐转向农业技术培训,凤阳县教育局将安徽农科院编制的《杂交水稻栽培手册》列为必修教材,通过重新定义“又红又专”的内涵,将技术能力提升与政治觉悟绑定。这种转换既规避了直接否定集体化教育传统的风险,又使教育机构从意识形态灌输器转变为生产力助推器。小岗村村民回忆,夜校教员从讲解“阶级斗争”转为演示“浸种催芽技术”时,刻意使用“科学种田就是爱国”的新表述,在技术话语中植入政治正当性,缓解了观念转型的突兀感。

2.2 话语重构

宣传策略的符号嫁接是第二重调适手段。面对“万农户”报道引发的争议,滁州市委宣传部将政策核心“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改编成皖北快板书,借助传统曲艺形式消解制度变革的激进性。这种民间艺术的政策转译具有双重功能,快板书的押韵节奏便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记忆,其娱乐属性弱化了政策本身的争议性。凤阳广播站每日六次播放的快板书录音,通过重复强化形成听觉记忆,使个体承包观念在潜意识层面渗透。同时,粮站收购点悬挂的“爱国粮”标语将粮食交易仪式化,农户售粮时获得的印有红旗的收据,将经济行为转化为政治表达。这种物质激励与符号激励的嵌套设计^[2],成功将个体理性纳入集体主义话语框架。更精妙的是对“勤劳”概念的重新赋义——过去强调“为集体流汗”,改革后解释为“为自己奋斗就是为国家做贡献”,通过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滑动,实现了价值导向的隐蔽转换。

基层组织的功能拓展构成第三重调适维度。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原本承担农资分配职能,改革后新增“承包户技术结对”服务,技术员下田指导时佩戴“支农模范”绶带,将技术服务包装成政治任务。这种身份符号的加持,既赋予技术人员权威性,又延续了集体化时期“下乡工作队”的仪式感。小岗村所在的板桥乡首创“高产擂台赛”,将承包户产量竞赛与“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评选挂钩,利用农民争强好胜的心理,将个体利益追求转化为集体荣誉竞赛。广播站每日播报的“先进户”事迹,刻意模糊勤劳致富与政治忠诚的界限,如将某农户深夜抢收粮食描述为“发扬大寨精神”,通过话

语移植维系意识形态连贯性。更具创造性的是对宗族网络的工具化利用,凤阳部分村庄将承包合同签订仪式安排在祠堂举行,利用族长权威增强政策合法性,这种“社会主义契约+传统伦理”的混合模式,有效降低了老年群体的制度抵触。

2.3 符号再编码

法律系统与民间习俗的互动形成第四重调适路径。当承包合同引发的土地纠纷增多时,基层司法所创造性地将《土地承包法》条文转化为“村规民约”,例如将“违约赔偿”表述为“对不住乡亲”。某调解案例显示,工作人员引用“邓小平同志说要解放思想”与“老话讲做人要讲信用”双重话语,实现政策法规与传统道德的共同论证。这种法治话语的在地化转译,使正式制度通过非正式渠道渗透。供销社系统则通过“农药换忠诚”策略,要求赊购化肥的农户签署“支持改革承诺书”,将物质支持与政治表态捆绑,这种经济手段与意识形态约束的结合,展现出阿尔都塞未曾论及的中国特色。

符号系统的意义再生产是更深层的调适机制。地方政府对“红手印”这一符号的重新阐释最具代表性,1978年小岗村秘密签约的手印原属“违法”证据,1982年却被塑造为“改革勇气”的象征,在博物馆陈列中刻意突出手印的“血色”,将其与革命烈士精神相联系。这种历史符号的重新语境化,使突破旧体制的行为获得传统革命话语的背书。春节期间的“改革春联”运动则体现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渗透,政府推广的“承包田里长金银,责任制上结硕果”对联,将现代经济概念嵌入传统民俗载体,在节日仪式中完成观念灌输^[3]。连小学生使用的作业本封底都印有“爱祖国、爱承包”标语,通过教育工具的细节设计实现意识形态代际传递。

3 多元决定的实践效果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果是意识形态调适、制度创新与传统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生产层面,个体承包激发了劳动热情,叠加集体符号的隐性激励(如“爱国粮”标语),推动凤阳县1982年粮食产量较1978年增长2.3倍。但社会结构随之分化,20%农户成为“专业户”,弱势家庭却边缘化,皖北农村基尼系数从1979年0.28升至1985年0.41。

意识形态调适呈现矛盾性,青年群体将农业技术与武侠小说并列传阅,混合实用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老年群体则通过田埂插红旗维系集体记忆。传统与现代的拼贴现象显著,如农户在祠堂签合同同时既鞠躬祭祖又高呼拥护改革,形成功能互补却逻辑悖反的共存。

基层治理通过“制度杂糅”维持稳定。例如,乡政府将“五保户”供养与“高产户”表彰挂钩,复制传统乡绅的“义行”模式;调解土地纠纷时,司法所借助“败祖业”等民间话语推行现代法治。这种弹性虽保障过渡期稳定,却导致产权模糊,为后续土地流转埋下隐患。

4 结论

综上所述,基层政权通过教育内容实用化改造、民

间艺术形式政策化转译等非强制手段,成功化解了制度转型的观念阻力。这种结构调适既保持社会主义话语的连续性,又为生产力释放创造弹性空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路径。

参考文献

- [1]王旗,孙倩倩.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激进解读[J].理论观察,2024,42(11):48-52.
- [2]要瑞雪.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阿尔都塞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重构[J].西部学刊,2023,56(1):138-141.
- [3]毕芙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基于卢卡奇与阿尔都塞之异同的一个考察[J].教学与研究,2023,8(4):105-114.